



## 中國民衆教育理論的批判

丁瓚

我們肯定着教育爲社會上層活動的一部門對於它的本質的認識應該從社會經濟機構的理解中去把握。中國一部分的教育學者爲了缺乏對於現代社會科學基本概念的了解，決定了他們對於社會現象觀察的膚淺與錯誤，在這裏，不僅表現出他們教育設施的無能，更暴露了他們對於教育理論的無知。誰都會對於今日中國教育的現狀，消極的表示不滿和失望，而很少的人能積極的運用比較正確的觀念和思想方法來糾正一般流行的教育理論上的錯誤，這在今日中國教育界上是最嚴重的危機。民衆教育，在中國是新近才發展的事業；對於它的認識，是更應該正確的分析了中國社會的現狀，瞭解了中國社會發展的動向而作爲理論和設施的根據的。在這一意義上，中國一部分的民衆教育學者給予我們的印象，是令我們失望的，他們對於現代社會科學素養的貧乏，因而使他們犯了不可忽視的錯誤——尤其是在理論上。這在我們觀察了中國社會的前途和他們在智識分子中的影響

時，是不能不起而作較爲嚴正的批判的。本文標題的不復用「商榷」「討論」一類的字樣，他正是爲了在這些理論上，有觀念的對立和認識的不同，要不用較爲確定的批判，是不易挽救流行的錯誤的理論在羣衆認識上的影響的。

李蒸曾經提出過民衆教育爲全民教育的理論；其所犯的錯誤，是有人批評過的。（見河北民衆實校週刊第五，九，十，各期）最近出版的教育與民衆（五卷一期），又有「民衆教育之意義與範圍的討論」的專欄，實施過了幾年而幾乎形成了近來中國教育運動上特殊階段的民衆教育，而其意義與範圍，據說「即在民衆教育界本身也是意見紛紜」，而沒有正確的中心理論這是何等的令人有「盲人瞎馬」的危懼；何況他們最近的討論上，大多數依舊是深陷於錯誤的「全民教育」的泥坑，這更使我感覺着中國現代民衆教育界是迫切的需要一些論理上啓蒙的文字，這是本文最近寫作的動機。如其有人說本文的

93528 內容，祇是一個教育學者最低限度必需的基本認識，似乎是用不着再費詞的；那末作者祇有帶着微微的苦笑來回答：『先生，我們批判的對象——一部分的中國民衆教育學者，是正需要着這些最低限度必需的認識的！』

對於他們——一部分的中國民衆教育學者的理論的批判，我可以提出兩個主要的論點來作爲本文的綱領，這兩點幾乎是他們共同的錯誤：

(一) 他們對於社會觀察的錯誤。

(二) 他們『全民教育』論的錯誤。

這兩點的先後排列，又表示出他們在理論上的錯誤的因果關係。現在且分述於下：

(一) 他們對於社會觀察的錯誤。

社會是什麼？這應當理解爲人類經濟關係或說人類勞動的結合；易言之，是生產關係的總體。所以一切社會現象的認識，應該從社會生產關係總體這一概念中去體驗。在這一前提上，他們便誤把『社會之所以能夠永續』、『社會之所以『共存共榮』』(？)的主要原因，歸爲『共同的思想情感』、『社會的精神』這一類東西。(見馬宗榮從社會教育說到民衆教育)而不知這一類的東西，祇是一定的社會生產關係所反映的社會上層建築，卻不能把這些來解釋社會的本質。我們知道思想感情和社會精神在社會中的功能，我們應更進一步的了解這些

是爲生產關係制約着。如其他他們知道了『文化』(Culture)這一字在拉丁語的語原中，本來是表示着『土地底耕作』的意思是『指一般有用的勞動而言』，他們是會同意我這一辨正的，由是我們可看到他們對於教育的意義的解釋，祇是『有意地行使的社會化作用』。(見馬文)這是何等的抽象虛玄而抹煞了教育在生活勞動上的意義。這些都足以表現他們對於社會的認識，是陷於『觀念論』的。中國現社會的崩潰，是不絕的直觀的刺激了他們，他們於是又在觀念論的社會認識之下，分析中國社會，這一來便又看到他們是差之毫釐，而謬以千里了。如說中國的毛病，祇在中國『民衆散漫，不能團結』、『具體一些說，我們中國人有幾種普通習性，很不適宜於現代社會，這幾種普通的習性是什麼呢……是消極無爲，坐以待斃……怕因多事而召禍……』(見高踐四從民衆教育的起源及任務說到民衆教育的真義)自然，這裏那裏的民衆，在暴力下進行的英勇抗爭，其團結力，在他是看不見的。更妙的是：『民衆自動組織政治經濟團體』來『和衷共濟』的用『調和協商』的方式來解決社會問題。(見高文)他就不曉得人類因對於生產的關係底相異而決定了生活條件的不同，從而其各個壁壘間底利害，必然發生衝突；這些衝突，在歷史上，從來不是『和衷共濟』、『調和協商』解決得了的。英國光榮革命，要不是克倫威爾和車夫勃來德(Pride)鍋匠福克(Folk)等人的流血，是可以『調和協商』而得到一六八八年的 Bill of Rights 的嗎？即使一八四七年

英國紡織工廠實行十小時的工作，表面是企業家的讓步，實際還是英國工人在伯明翰事件中用血換來的。許多歷史的顯明的事實，他們爲什麼便不一檢閱。他們蔑視社會的階級事實，感情的忽略了階級間抗爭的必然性，無限制的濫用民衆二字，而不知現實社會上經濟條件已區分民衆爲無從調和的壁壘，在今日社會非常的發展中，對於這些理論上錯誤的糾正，我們是不應該坐視的，他們又說「中國的內亂頻仍，官僚軍閥的剝削，帝國主義的壓迫」，「一切的一切全由於民衆的愚昧，貧窮，衰弱，散漫有以致之。」（見陳禮江民衆教育的意義及其特質）

其實，自胡適發表了「我們走那條路」，有識者就慨歎着中國所謂學者們認識和知識的貧薄，即使是梁漱溟，也表示不同意的。陳禮江在這裏無批判的引用胡文，而完全沒有知道已有人對於這種理論加過糾正，而現在在發表民衆教育文字時猶引爲經典，即站在學術研究的立場上，我們也不得不引爲憾事的。這些都是由於他們根本沒有了解一切社會病狀，是一時代社會經濟機構發生動搖所致。他們祇抓住一些零碎的中國社會的現象，而不肯更進一步的理解發生這些現象的中國社會的本質，祇說出「果」而未能了解決定果的「因」。要是說祇憑現象而可以不必深究本質，來作爲各種問題的探討，那末科學是慘酷的被埋葬了。中國現在的社會的主要病源，是在帝國主義的商品侵略和國內的封建剝削，捨剝除此兩種障礙，中國是沒有其他生路的；在這樣意義的社會變革中，民衆文化水平的必須提高，民衆認識上必須的

啓蒙開拓我們自然是認爲重要的。我們一點也不忽視所謂「知識」在現社會變革中的重要，但我們要告訴民衆以中國主要病根，要告訴民衆，他們爲什麼被劃在智識圈外的理由，如其祇說中國病在愚昧散漫等，則無異是替中國革命的對象，擲了一些煙幕彈，蒙蔽了中國革命民衆對於真正敵人的認識。其影響所及，又豈止於「教育設施的無能」呢？清末維新變政時，士大夫皮相觀察的錯誤所遭遇的慘敗，也夠教訓我們了吧！

### （二）他們「全民教育」論的錯誤。

人們在社會中「爲了歷史上被規定了他們在社會生產關係底體系中的地位，爲了他們對於生產手段的關係，爲了勞動底社會的組織中的他們底任務，因而爲了他們依怎樣的方法，在什麼程度，領受在社會的財富中所能自由使用的部分，而互相被區爲人類的集團。」便產生了社會上的階級。這是一個非人類意志所能否認的事實。即使我們是如何痛心階級社會的罪惡，但我們無從否認階級事實的存在，如同我們厭惡猩紅熱的病症，而不能說沒有猩紅熱這一病症一樣。社會既因生產關係發展過程中有了階級的分劃，那末全民社會的理想，不會存在於階級社會中，並不是怎樣高深的學理，祇是明顯的常識。既沒有全民社會的基礎，而想實行全民教育的理論，這才真「緣木求魚」的「愚昧」了。他們說：「民衆教育，須就實地生活需要，培起全民力量，運用團體，根據理性，以解決一切社會問題。」（見高文）「民衆即是

93530 全民『中國民衆教育的對象』應指作中國的全民（見陳文）『民衆教育之民衆，是萬民的意思應作全體民衆的略稱』（見馬文）我

們把全民教育作為教育理想是可以的，但全民教育必在消滅階級的全民社會中，才有實施的可能。在中國現社會中，我們不能拿最後的理想，來掩蔽民衆教育的現實性和特殊性。這裏我想到孟憲承在其民衆教育（世界書局版）中的一段話倒是比較高明的，『現在教育上最成爲問題的，與其說是全體，不如說是大多數的人民。只要教育普及了，大多數人都已有了少數人的教育機會，那末，民衆教育也就不成怎樣特殊的嚴重的一個問題了。』（原書頁七）而且在歷史上試問有過全民教育這末一回事麼？（自然要除開原始社會。）現在歐美的成人教育，補習教育，蘇聯的成人學校，丹麥的高等民衆學校，是全民教育嗎？要是我們考慮一下，施教者是誰？受教者是誰？教育的内容，是以何種社會意識爲其主幹？那末我們可以恍然大悟的知道歐美現在固然不是全民教育，即使蘇聯，現在也還不是全民教育。或許他們要說這是外國情

形，中國現在可以會有全民教育的，那末孫中山的解釋革命民權和天賦人權的不同，其命意何在？國民革命而不稱爲全民革命，其用意又何在？至於他們引用『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而說對於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一概可以施以教育，這更是不了解階級社會中，統治階級的意識，爲其教育的主要內容，伊尹管仲不過是在維護湯與桓公的統治的前提下，貢獻一點統治的技術，和普通的教育不可相提並論的。從此我們可以了然中國民衆教育學者說民衆教育就是全民教育，不僅表示了他們對於現實社會的隔膜，更顯示了他們對於現代社會科學的見解。

我的結論是國內一部分民衆教育學者對於社會科學的茫然，從而對於社會的觀察錯誤，更冒昧的提出全民教育的理論，是值得關心教育的人嚴重注意而糾正的。

——十月十五日寫於陰森的學園——

